

现存汉唐西域佛剧的文本考述

汤德伟¹, 高人雄²

(1 安庆师范大学, 安徽 安庆 246133; 2 西北民族大学 文学院, 兰州 730030)

摘要: 现存汉唐时期西域的佛教戏剧主要有梵文《舍利弗传》、吐火罗文本《弥勒会见记》、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和晚唐敦煌本《释迦因缘剧本》。根据目前的考古发掘, 汉唐西域佛教戏剧可以说是汉唐西域戏剧占绝对地位的一部分, 彰显了佛教传播方式的多元化和佛教悠久的历史魅力。文章对现存汉唐西域佛教戏剧的文本进行详细的考述, 对它们的问世、作者、成书时期、校刊、整理研究等情况做一番梳理。

关键词: 西域; 佛教戏剧; 弥勒会见记; 文本; 考述

中图分类号: I207.3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2094(2018)05-0063-08

DOI: 10.13974/j.cnki.51-1645/z.2018.05.011

The Research on the Text of Existing Buddhist Dramas in the Western Regions from Han Dynasty to Tang Dynasty

TANG Dewei, GAO Renxiong

(1. Anqing Normal University, Anqing 246133, China;

2. School of Literature, Northwest Minz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30, China)

Abstract: Existing Buddhist dramas in the western regions from Han dynasty to Tang dynasty mainly include The Sanskrit of the relics of Buddha, Tocharian Buddhist drama Maitreya credited with, Uighur Maitreya Credited with, Dunhuang Shakyamuni script. On account of current excavations, Buddhist dramas in the western regions from Han dynasty to Tang dynasty can be said to play an absolute position, showing the diverse mode of transmission of Buddhism and a long cultural history. The author has been researching the text of the existing Buddhist drama in detail and the author will sort out their publication, author, writing time, emendation, research and so on.

Key words: the western regions; Buddhist dramas; Maitreya credited with; the text; research

20 世纪, 新疆吐鲁番、焉耆等地发现的《舍利弗传》等三部梵剧残本、吐火罗文与回鹘文《弥勒会见记》佛教剧本以及李正宇先生校订的晚唐《释迦因缘剧本》, 是我国文化史、文学史与戏剧史上颇为重要的文献。对这些弥足珍贵的汉唐时期西域佛教戏剧应给予应有的重视, 文章试考述其始末。

一、《舍利弗传》等三部佛教戏剧残本

论及西域的戏剧, 首先要提及 20 世纪初德国王家普鲁士吐鲁番考察队在我国新疆吐鲁番地区发现的印度与中亚失传的三部贝叶梵文剧本残卷。至于具体的发现时间、地点和发现者, 据杨富学先生《德藏西域梵文写本整理与研究回顾》考证, 这是德国人阿尔伯特·冯·勒柯克在 1904 年 11 月至 1905 年 8 月于吐鲁番火焰山胜金口发现的三件梵文剧本^①。1911 年德国学者吕德斯

收稿日期: 2018-06-23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东西文化交流视野下的先唐西域文学研究”(11BZW28)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汤德伟(1989-), 男, 安徽舒城人, 文学硕士, 安庆师范大学讲师, 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

高人雄(1957-), 女, 浙江杭州人, 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中国语言文学”省级重点学科带头人, 石河子大学绿洲学者, 甘肃省领军人才, 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

(Heinrich Lü ders) 将其整理, 并出版《佛教戏剧残本》(《梵文戏剧残片》) 一书。这三部梵剧为国人所知悉, 最开始是在许地山《梵剧体例及其在汉剧上底点点滴滴》一文与金克木著《梵语文学史》^② 一书中, 他们是根据德国吕德斯教授的考证而在国内公布的。其中较完整的一部是 9 幕剧本, 残存最后 2 幕, 题名为《舍利补特罗婆罗加兰拿(拏)》, 即马鸣所作《舍利弗传》或《舍利弗所行》, 该剧卷末注明作者是: “金眼子马鸣”^[1]。该剧共 9 幕, 有 150 个残叶, 用贵霜体梵文书写, 题记的文字是早期中亚的婆罗谜字母, 应为收藏者添加的, 现存于德国国家图书馆, 另外两个残本没有署名。这三部梵剧抄本在古印度早已失传, 但却时隔一千多年在我国新疆吐鲁番地区发现。

马鸣(梵名 Asvaghosa, 汉译音阿湿缚婆沙) 是中印度人, 佛教理论家、佛教诗人、梵剧作家。他是有作品传世的第一位梵剧作家。有学者考证, 马鸣的生存年代为公元 1-2 世纪。他原来信奉婆罗门教, 后皈依佛教。他在中印度弘通佛法, 鸠摩罗什《马鸣菩萨传》载其“博通众经, 明达内外。才辩盖世, 四辈敬伏”^[2]。除精通佛典外, 马鸣在文学、诗歌和音乐方面也有颇高的造诣。除戏剧《舍利弗传》外, 他的作品主要还有梵文本长篇叙事诗《佛所行赞》、《美难陀》等。

对于新疆发现的梵剧《舍利弗传》的名称、形式、内容, 许地山先生进行过考证: “吕德斯所发现马鸣三剧中, 主要的是《舍利补特罗婆罗加兰拏》, 全名作《婆罗德婆提·补特罗·婆罗加兰拏》共分九出。此剧底标题记马鸣底父亲名苏伐拏支。”“这剧底诗句有些是从马鸣自己底《佛所行赞》取出来底。是目犍连与舍利弗皈依佛底事迹。”^[3]¹⁷ 由此可见, 《舍利弗传》的内容讲的是佛陀的弟子舍利弗与目犍连皈依佛教的事迹。其它两部戏剧残缺严重, 但仍知道其主要内容是布教。

论及《舍利弗传》的成书时间, 据作者马鸣在世时间推断, 应该在公元 1 至 2 世纪。该剧随着印度佛教东传而传至我国西域地区。根据西域考古遗存与出土文书考证以及吴焯先生所述, “佛教传入西域的时间为公元二世纪上半叶……佛教

传入西域速度之快、来势之猛、发展之快, 均非内地可比。”^[4] 许地山先生认为梵剧《舍利弗传》“这曲什么时候入中土虽不可知, 但总不能后于《佛所行赞》(北凉昙无讖译) 许久”^[3]¹⁷。昙无讖(公元 385-433 年), 中天竺僧人, 北凉时入华。再者, 我国发现的用吐火罗文书写的文献集中在公元 6-8 世纪, 由此可以作出推测, 《舍利弗传》约成书于 1 至 2 世纪, 约 3 至 5 世纪传入我国。

对于《舍利弗传》的材料来源, 许地山先生考证“剧中材料虽由传说中取出, 而剧情则由作者自由创作。故内典家译这个字为‘极所作’。”^[3]¹⁷ 因此可知此剧散文大多来自印度传说, 韵文来自《佛所行赞》。

《舍利弗传》不仅在西域上演, 还影响到了中原。“舍利弗”在唐代是一个重要的曲目, 中原地区的民众对舍利弗的故事较熟, 演出时用的曲调也很优美。李白在《舍利弗》一诗中赞赏说: “金绳界宝地, 珍木荫瑶池, 云间妙音乐, 天际法蠡吹。”^[5] 任半塘先生指出: “舍利弗与摩多楼子竞联列, 在二李集中, 两调又并有辞, 则显具重大意义! 两调殆为剧中之所同用, 原剧本殆由西域传入中土, 翻译或改编为汉剧, 即以故事中二主角之名名曲调。”^[6] 任先生指出舍利弗的故事最早是在初唐或之前, 该剧到盛唐还在上演, 所以李白才有这样的诗句。李白所述的舍利弗辞, 基本上应为“舍利弗”剧内的曲调, 而不是普通的杂曲。由此可推测唐代已经存在戏剧, 水准最低和梵剧差不多。

二、吐火罗文与回鹘文《弥勒会见记》

20 世纪初德国王家普鲁士考察队在天山南部的四次考古发掘以及我国考察队的考古发掘发现了另外两部佛教戏剧文本, 即吐火罗文(焉耆文)本《弥勒会见记》和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

(一) 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

吐火罗文本《弥勒会见记》写本是阿尔伯特·格伦威德带领德国第三次王家普鲁士考察队于 1906 年 5 月在焉耆的舒木楚克遗址所发现的^③。对吐火罗文(焉耆文)本《弥勒会见记》的考察活动我们可从杨富学先生《德藏西域梵文写本: 整

理与研究回顾》^④一文获知。所拿走的这些焉耆语断简残篇收在 E. Sieg 和 W. Siegling 的《吐火罗文残卷》中。季羨林先生说：“这些残卷数量不很大，但是从字体和行款来看，它们不属于一个本子，而属于许多本子；这些残卷中所讲到的内容也不属于一幕，而属于许多幕。”^{[7]42}1974 年我国的考古人员在焉耆县锡克沁千佛洞附近又发现了吐火罗文 A 本（即焉耆文）《弥勒会见记》，此吐火罗文本残卷计有 44 叶，88 页，原件是用中亚婆罗谜斜体字母墨书在长约 32 公分、宽约 18.5 公分的发黄的纸上。由于被火烧过，残卷缺损严重，几乎每叶都被烧掉一半以上，有的只有几个字，没有一张、一面、一行是完整的，现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首页写有两行字：“在（圣）月整理好了的《弥勒会见记剧本》中，名叫《婆……》第一幕终。”^{[7]43}该幕名称原文中有空缺，季羨林先生参照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内容，指出应该是“婆波离的婆罗门举行布施大会”几个字。每幕的开头都用朱墨标出故事发生的地点和场次，另外还标出了演唱的曲调和出场人物。如此种种，都可证明它是一个戏剧剧本，对此剧本的定性，季羨林先生有详细的论述^⑤。至于成书时间，据德国学者汤姆斯（Werner Thomas）研究，这些吐火罗文本《弥勒会见记》残卷成书是在 6 到 8 世纪，即中国的隋唐时期^⑥。

南疆在近代出土了古龟兹 - 焉耆语《难陀本行集剧本》（*Nahdacaritanā taka*）和关于 *Aranemi* 国王的剧本残本^⑦，也都属于吐火罗语语系。因为残损严重，它们的具体形式还要作进一步的研究。廖奔先生指出：“吐火罗文佛教剧本在新疆地区的诸多呈现，是印度文化向东渗透留下的清晰痕迹。”^[8]

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整理研究的开山者为德国的学者缪莱，1907 年他在《对确定中亚一种不知名语言的贡献》一文中刊发了吐火罗语 A 本《弥勒会见记》的有关片断，1916 年他又和泽格联合发表了《〈弥勒会见记〉与‘吐火罗语’》一文。在 E. Sieg 和 W. Siegling 的 *Tocharische Sprachreste*（Berlin und Leipzig, 1921）中刊

布了一些同一剧本的残卷。另外法国学者皮诺尔 Georges pinault 也负责整理了一批西域吐火罗文写本，他在 20 世纪 80 年代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法藏龟兹文佛典和世俗文书的论文，如《一件龟兹语佛教戏剧残卷》等^⑧。

季羨林先生对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他指出新博本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第一张第一页有“第一幕终”字样，“幕”字是“从梵文 *ni pā ta* 借过来的，它的涵义是‘幕’。”^{[7]43}他强调：“这一部书不是经，而自称是剧。”^[9]后来在《吐火罗文和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性质浅议》一文中，又对它的体裁和性质作了详细的剖析和明确的判断，并得出结论：“是看图讲故事的戏剧”，“新疆古代确实有戏剧的，《弥勒会见记》就是其中最突出的。”^[10]季先生的权威性是毋庸置疑的。

（二）回鹘文《弥勒会见记》

新疆共发现了几种回鹘文的《弥勒会见记》，像吐火罗本一样也遭受分隔于两处的厄运。一为以勒柯克为首的德国考古队于 20 世纪初在吐鲁番的木头沟、胜金口等地发现的残叶，现藏于德国梅因茨（Mainz）科学院和柏林科学院，通常称之为“吐鲁番本”。德国突厥学专家葛玛丽按其出土地点称为：两种是“胜金本”，两种是“木头沟本”，另外两种的出土地点还没查明。其中胜金口本有十几张是完好的，占全书的十分之一，是保留下来页数最多的，为勒柯克在到达吐鲁番的第二年（1905 年）2 月在吐鲁番火焰山森其姆峡谷一个“印度塔”内发掘。

另外就是哈密县脱米尔提大队（今天山区板房沟乡）的维吾尔族牧民牙合亚·热依木 1959 年 4 月在放牧时在一佛塔废墟的毡包中发现的。经专家考证，此为回鹘文剧本《弥勒会见记》的抄本，距今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该剧本是比较完整的文本，经专家学者整理，共 293 叶 586 面（里面完好的有 114 叶 228 面）。装帧形式为梵夹式，纸质厚硬，纸张是褐黄色。每叶是 47.5×21.7 厘米，每叶上下左右都空有一样的空白。每面用黑墨从左到右竖着写有 30 或 31 行工整美观的回

鹘文字,每叶左侧都用黑色小字回鹘文标出品(幕)数和叶数,有的幕前用朱笔标出演出的地点。每叶第7至第9行间用浓墨细线画着小圆,直径为4.6厘米,圆心空着0.5厘米直径的绳孔。该文本现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回鹘原称回纥,是今天维吾尔族的先民,回鹘文是8-15世纪回鹘人的文字。《弥勒会见记》属于小乘佛教的舞台作品,但其中也杂有许多大乘教的观点。哈密本全剧原应有序章和二十七幕正文,其中五一九、十二、十七—十九、二十二幕不存,第二十六、二十七幕仅存一些残文。有学者指出哈密本是各种版本中最为完整的,是由序章和二十七幕正剧构成的大型佛教剧本^⑨。

据耿世明先生整理研究的第1、3、10、12、16、20、21、23、25、27幕结尾都有内容相同的跋语可知,回鹘本交代了剧作的作者和译者。如第1幕说:“精通一切经论的、像甘露一样痛饮毗婆沙诸论的圣月菩萨大师从印度语制成吐火罗语,智护戒师又译成突厥语的《弥勒会见记》中的”跋多利婆罗门行施舍“第一章完。”^[11]

据此可知,本剧先是圣月大师据印度文本译为吐火罗语(古焉耆语),后来智护大师又从吐火罗语转译为突厥语(回鹘语)。单从这里我们无从知晓该处所说的印度语是指梵语还是其他语,但是学者们多数倾向于是梵语。据考,该剧本的翻译者圣月大师是唐代三崙里迷国(即焉耆)著名的佛学家和经书翻译家。葛玛丽根据在德国的写本称另外一个译者智护是I-baliq人,说他是出生在伊犁^[12]。而哈密本则认为I1/El-baliq是“国都”的意思,有可能是指回鹘汗国的国都高昌^[13]。

无独有偶,回鹘文译本《十业道譬喻鬘》的跋文就明称:“精通毗婆沙论、咒法和诗文的众奴从乌古-龟兹语译为‘吐火罗语’(即焉耆语),尸罗森那大师又(从‘吐火罗语’)译成突厥语的《十业道譬喻鬘》……”此经先由乌古-龟兹语译为吐火罗语,再由吐火罗语译为突厥语^⑩。

德国学者对吐鲁番发现的回鹘本《弥勒会见记》做了一系列的研究。对德国吐鲁番考察队发

现的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的全面整理研究与介绍,首推德国著名突厥语女学者葛玛丽(An-nemarie von Gabain,我国译本多署名为冯·加班,1901-1993年)。她于1957年刊布了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影印本共113叶,取名《弥勒会见记I》(Mitrisimit I),是二战期间转移到美国因茨(Minz)保存的。1961年她又将保存在柏林科学院的另一部分共114叶残卷影印公布,定名为《弥勒会见记II》(Mitrisimit II),并附有一册说明书。另外于1961年至1973年期间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论著与论文,如《高昌回鹘王国:850-1250年》、《高昌回鹘王国的生活》等。葛玛丽在系统研究后指出《弥勒会见记》是回鹘戏剧艺术的雏型。法国学者哈密顿1958年在《通报》46卷上刊登了依据葛玛丽发表的影印本而写的书评。1970年土耳其学者特肯(Sinasi Tekin)作了系统整理后在《德国东方学研究通讯》16期上,刊发专文讨论该文本的成书年代。1980年,特肯(Sinasi Tekin)又把全部欧洲的手稿全部转写并译成德文。

(三)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的文体及成书年代

1. 文体

关于回鹘哈密本《弥勒会见记》文体的争论,耿世明先生说《弥勒会见记》:“是我国维吾尔族的第一部文学作品,同时也是我国各民族(包括汉族)现存最早的剧本。”^{[14][21]}维吾尔族研究专家多鲁坤·阙白尔先生在《〈弥勒会见记〉成书年代新考及剧本形式初探》一文中指出:“可以肯定《弥勒会见记》完全具备剧本的特征。”^[15]回鹘文哈密本《弥勒会见记》中没有标出曲调和出场人物,但每章(幕)前均标有地点,跋文中又记有幕名。作品中也有音乐伴奏的场面,而且每一章(幕)的故事情节都是通过具体人物的对话形式来表现的。“书名中也不用回鹘人常用于佛经的‘sudur’(经),而用‘nombitig’意为‘书’,也就是说通过生动的故事形式表现宗教思想的一种故事书(而不是纯粹讲佛道的经)。并且文中还有‘kθ rū nq’一词,意为‘场’,……回鹘文《弥勒会

见记》充满了浓厚的剧本色彩,完全具备剧本的特征。”^[16]

但是在对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的研究中,有一部分学者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观点。冯家升先生与周叔迦先生商论后认为该文本“大概是由《贤愚经》卷十二《波婆离品》演绎而成的一种变文”^{[17]90}。李经纬先生认为是“关于弥勒一生重要事件的故事集”^[18]。曲六乙先生在《宗教祭祀仪式:戏剧发生学的意义》“代序”中持保留意见,“不能认为《弥勒会见记》文本是说唱文学作品,就断定它不是戏剧演出本。”^[19]耿世民先生在本世纪初《古代维吾尔语说唱文学<弥勒会见记>》一文中进一步定位了该剧本性质,指出“它似为一种看画讲故事并可能带有某种表演的原始戏剧,可能近似于藏戏”^[20]。

《弥勒会见记》的文体是何种性质,在学术界曾引起很多争论。随着学者研究探讨的深入,笔者认为《弥勒会见记》不是简单层面的文学写本,而是一部珍贵的古代佛教戏剧剧本。

2. 产生年代

除了文体的争论以外,学界对回鹘文本产生年代的观点也是不同的。多鲁坤·闾白尔先生在《<弥勒会见记>成书年代新考及剧本形式新探》一文中,较全面地介绍了回鹘文《弥勒会见记》成书年代的争论情况。纵观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观点,争论不外乎两类意见,一种是8~9世纪,一种是公元10~11世纪。主张形成于8~9世纪的学者有:

1970年,土耳其学者特肯教授在《德国东方学研究通讯》16期上发文认为,767年在高昌出土的回鹘文庙柱文中的施主,和葛玛丽1961年影印本第219号残叶中提到的kīanpat ri(梵文为“善贤”)是同一人^⑪,再依据写本的字体特点,认为是成书在8世纪中期^⑫。1980年,耿世民先生发表了《唆里迷考》一文认为,“从字体来判断似写于十世纪左右。”^[21]1981年提出新的观点:“考虑到当时高昌地区民族融合的情况(当地操古代焉耆语的居民在八至九世纪时已为操突厥语的回鹘人所同化吸收),我认为《会见记》至迟应

成书于八至九世纪之间。”^{[14]215-216}

主张形成于10~11世纪的学者有:

法国哈密顿教授1958年在《通报》46卷中发表书评指出,敦煌出土的大部分10世纪的回鹘文字体和德藏本字体一样,所以应该抄本于10世纪^⑬。1962年,冯家升先生在《文物》7、8合期中发文章说,根据回鹘人信教情况,哈密本应该在“第十和第十一世纪之间”^{[17]91}。

总体来说,持公元8-9世纪的学者比较多。以上说法,基本上是根据剧作的内容和语言文字的特点做出大致推测。多鲁坤·闾白尔先生则对哈密本序幕中有关该文本成书时间的原文,做了详细的考证研究。如序章第十叶中有:“有福的羊年辰三月二十二日,我敬奉三宝的信徒曲·塔什依甘都督和夫人贤慧一起……并使人书《弥勒会见记》一部。”“把此功德首先施向我们的登里牟羽颉毗伽狮子登里回鹘皇帝陛下,值得赞美的十姓回鹘汗国……”他引《旧唐书》记载:“乾元二年(759)四月,回纥毗伽阙可汗死,长子叶护先被杀,乃立其少子登里可汗。”《文献通考》、《新唐书》中都是“牟羽可汗”,他认为序幕里提到的登里牟羽颉毗伽狮子登里回鹘皇帝陛下姓名和文献中记载的牟羽可汗(又称登里可汗)一致。后肯定回鹘文哈密本的具体成书时间是牟羽可汗执政的第八年——公元767年^⑭。

目前学界基本的共识即应当在唐朝突厥牟羽可汗时期形成。多鲁坤·闾白尔先生考证详实,笔者赞同其观点。先生在根据语言文字特点和内容大致推测出年代的基础上,结合哈密本语言文字特征、早期的语法现象在该剧中的留存,加之史料的佐证进行断定,笔者认为其对哈密本《弥勒会见记》抄写年代的考证是准确的。另外,土耳其学者特肯发现人名“kīanpat ri”(“善贤”)和高昌出土的公元767年回鹘文庙柱文中的施主为同一人。这种不谋而合印证了哈密本《弥勒会见记》抄写于公元767年。

有些学者还推测说,《弥勒会见记》约在公元2世纪左右就在西域出现了,首先应该是出现在龟兹,主要是因为而龟兹是当时西域最重要的佛

教文化中心。戏剧有人物和情节的表演,运用通俗易懂的戏剧形式来进行宣传佛教,有利于吸引广大的民众并为民众所喜爱。西域东部哈密也发现过回鹘文《弥勒会见记》,体现了佛剧在西域的广泛传播和流行,说明古代回鹘人民对佛教文化的喜爱。

三、有争议的敦煌佛剧《释迦因缘剧本》

敦煌佛戏的提及始见于任半塘先生的《唐戏弄》、赵景深先生的《目连故事的演变》^[15]。饶宗颐先生于《敦煌曲与乐舞及龟兹乐》一文中确认敦煌遗书《太子成道经》背面为唐代歌舞剧,并睿智地论述:“此记表演《太子修道》之歌舞剧,文中所言吟之人物有大王、夫人、吟生、新妇,可知‘吟’即唱词。”^[22]与此同时所收发的石路先生的《释“熊踏”——兼谈唐代戏曲》一文亦确认敦煌《太子成道经》S. 2440 背面为唐代戏曲,“是一部难得的唐代佛教剧本存件。按王国维先生的‘歌、舞、剧、代言体兼备即谓戏曲形式’的主张,则该卷足可证实:中国戏曲在唐代即已产生。”并具体分析认为载歌载舞的场面之中,出现了代言体的戏剧人物的‘吟’(唱),因此,可断定其为戏曲形式无疑。”^[23]

《敦煌研究》刊发过李正宇先生的《晚唐敦煌本〈释迦因缘剧本〉试探》一文,公布了他整理校订的此戏文本。文中他视由《太子成道经》所演变的《释迦因缘剧本》“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汉文剧本。”^[24]黎蔷先生也赞同该观点,认为记载为“长兴五年”(934年)的该剧是“迄今所发现的最早最完备的汉语剧本”^[25]。

任半塘先生在《唐戏弄》中认为有几个文本已接近剧本。一是 S2440. 2 号《太子成道经》。现今发现的敦煌卷子中有十多个关于太子成道故事的押座文、讲经文,任先生认为此卷“由多人登场”,“吟词白语,分别出于各种人之口,其所有代言,便与讲唱体中之代言有别”^[26]。另外还有舞台提示,它可能以“另一体裁单行”,即为剧本体。二是敦煌零拾载维摩诘经问疾品一本和[光]字九十四号载菩萨品一本,文中都出现了“白”的标识,且菩萨品一本中“白”和“吟”并举^[16]。但这明显是

唱和说的区别,并且全文是第三人称的叙述体。

研究发现,敦煌遗书 S. 2440 卷背第二件文书是一个表演释迦牟尼出生出家故事的独幕剧本。此卷为晚唐时期的写卷,墨笔书写,竖形,小字,行书,23行,528字,1900年出土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原件被斯坦因携往英国,今存伦敦英国图书馆。

敦煌学专家李正宇先生认为,它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汉文剧本。通过它,可以看到我国原始剧本的体式和特征,窥探我国剧本体裁的诞生,同时为宋元时代成熟剧本的某些程范追溯一些渊源。李正宇先生把这个剧本命名为《释迦因缘剧本》。

按照李正宇先生的校订,《释迦因缘剧本》其有角色、唱词、表演故事,是一种原始形态的歌舞剧。李正宇先生认为,《释迦因缘剧本》是我国戏剧史、文学史上的新记录。它的出现,意味着戏剧正式诞生了,大大地提前了我国汉剧创作的历史。

余论

汉唐时期西域的佛教戏剧是我国古代各族人民的伟大成果。汉唐时期的西域佛教戏剧或为吐火罗文,或为回鹘文,只有流传到中原通往西域的文化关口——敦煌,才蜕变为汉文。汉唐西域佛戏的生发、形成,既有本身的内部因素,又与邻近民族、国家文化的影响、交流是分不开的。

西域佛剧是从古印度戏剧翻译过来的,戏剧文本翻译的过程,也是文学艺术再创作的过程,必然要加入新的内容和融入新的形式。印度本为歌舞、戏剧发达的国家,梵剧的形成远早于中国传统戏曲。另外,西域佛剧的内容又是在佛经的基础上演绎而成。西域佛教戏剧是带有浓厚佛教印记的戏剧,这种惊人的成熟正是佛经文学营养催生而成的。对于西域佛剧而言,也正是佛经中有大量的戏剧性因素,才使得西域佛剧的艺术特性独具特色,赋予了西域佛剧丰盈的文化魅力。西域佛教戏剧是从佛经浓郁的戏剧性基础上形成的,在印度就已经从经文敷衍成梵文佛教戏剧,到西域的时候其实是由梵文戏剧编译为西域的佛

戏。所以汉唐西域佛剧是以印度戏剧文学为根基,受古印度戏剧文化的直接影响,间接地受到佛经文学的影响,在西域经过加工改造,融合了西域的地域文化因子特别是西域佛教文化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民族戏剧样式。吐火罗文和回鹘文的《弥勒会见记》,实际上是一种跨国界、跨文化的戏剧翻译加创作过程。

西域佛剧真实的上演情况至今仍是未知,具体从文本来考察西域佛戏会发现,它是歌、舞、剧的有机综合,表演形式自由灵活的戏剧样式。其中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人物、对话较多,体制比较庞大。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经过再次转译之后,只在文本叙事、曲调上和梵剧有一定的相似

点。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的剧本特征被弱化,讲唱味道较浓,自由灵活度更大。

西域佛教戏剧是西域的一种古老独特的戏剧,在舞台表演上西域佛剧有其自身的特质和风格。《弥勒会见记》幸运地留存了下来,留给我们宝贵的文学艺术珍品。当我们重新审视西域佛剧的发展时,就会发现佛教文化的传播不断地滋养独特的本土文化,继而创造出厚重的地域文化。西域佛教戏剧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文化景观,它彰显出独特的文学魅力、艺术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是中国古代戏剧史和文学史上一笔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

注释:

- ①参见杨富学,《德藏西域梵文写本整理与研究回顾》,载于杨富学著,《西域敦煌宗教论稿》,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 年版,第 150-153 页。这三部梵剧残本的考证和德国人的考察活动还可见于:陆庆夫等著,《中外著名敦煌学家评传》,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 年版,第 233-246 页;魏长洪等编,《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 年版,第 184-368 页;荣新江著,《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第 81 页。
- ②参见郑振铎编,《中国文学研究》(下),上海书店出版社,1981 年版,《梵剧体例及其在汉剧上底点点滴滴》一文第 17 页;金克木著,《梵语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 年版,第 262 页。
- ③参见(德)阿尔伯特·冯·勒柯克著,陈海涛译,《新疆的地下文化宝藏》,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 198-199 页。
- ④参见杨富学著,《西域敦煌宗教论稿》,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 年版,第 150-153 页。
- ⑤参见季羨林,吐火罗文 A(焉耆文)《弥勒会见记剧本》与中国戏剧发展之关系,《社会科学战线》,1990 年第 1 期,第 310-313 页;季羨林著,靳尚怡、赵辉译,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剧本》译文 -- 对新疆博物馆本(编号 76YQ1.16 和 1.15)两叶的转写、翻译和注释,《语言与翻译》,1992 年第 3 期,第 9-11 页。
- ⑥参见廖奔,从梵剧到俗讲 -- 对一种文化转型现象的剖析,《文学遗产》,1995 年第 1 期,第 68 页。
- ⑦参见 E.sieg: ü bersetzungen aus dem Tocharischen II, ADAW, 1952, s.34.
- ⑧参见荣新江著,《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
- ⑨参见廖奔,从梵剧到俗讲 -- 对一种文化转型现象的剖析,《文学遗产》,1995 年第 1 期。
- ⑩参见耿世民著,《耿世民维吾尔古代文献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 300-301 页。
- ⑪参见 F. W. K. Müller. Zwei Pfahlschriften aus Turfanfunden [M]. APAW, 1915. p.23.
- ⑫参见 S. Tekin. Zur Frage der Datierung des Uigurischen Maitrisimit (MIO 16) [M]. 1970. p.132.
- ⑬参见 J. Hamilton. Review of A. von Gabain Maitrisimit (TP46) [M]. 1958. P. 442.
- ⑭参考多鲁坤·阙白尔,《弥勒会见记》成书年代新考及剧本形式初探,《戏剧》,1989 年第 1 期,第 17 页。
- ⑮参见赵景深,目连故事的演变,《小说月报》,1941 年第 13 期,第 63-116 页。
- ⑯参考任半塘著,《唐戏弄》(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 10 月版,第 933 页。

参考文献:

- [1]王邦维.法显与《法显传》:研究史的考察[J].世界宗教研究,2003(4):26.
- [2]糜文开.印度文学历史名著选:上[M].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18:394.

- [3]郑振铎.中国文学研究:下[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1.
- [4]吴焯.从考古遗存看佛教传入西域的时间[J].敦煌学辑刊,1985(2):71.
- [5][清]彭定求.全唐诗:第三册[M].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2004:932.
- [6]任半塘.唐戏弄: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651-652.
- [7]季羨林.谈新疆博物馆藏吐火罗文A《弥勒会见记剧本》[J].文物,1983(1).
- [8]廖奔.从梵剧到俗讲——对一种文化转型现象的剖析[J].文学遗产,1995(1):68.
- [9]季羨林.吐火罗文A中的三十二相[J].民族语文,1982(4):6.
- [10]季羨林.吐火罗文和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性质浅议[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2):69.
- [11]耿世民.回鹘文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89-90.
- [12]A. von Gabain. Maitrisimit I[M]. Wiesbaden, 1957:20.
- [13]J. Hamilton. Review of A. von Gabain Maitrisimit (TP46) [M]. 1958:443.
- [14]中华书局编辑部.文史:第12辑[M].北京:中华书局,1981.
- [15]多鲁坤·阙白尔.《弥勒会见记》成书年代新考及剧本形式初探[J].戏剧,1989(1):19.
- [16]回鹘文弥勒会见记1[M].伊斯拉菲尔·玉素甫,等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4.
- [17]冯家昇.1959年哈密新发现的回鹘文佛经[J].文物,1962(7/8).
- [18]李经纬.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三弥底经》初探[J].喀什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1):14.
- [19]曲六乙,李肖冰.西域戏剧与戏剧的发生[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6.
- [20]耿世民.古代维吾尔语说唱文学《弥勒会见记》[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127.
- [21]耿世民,张广达.唆里迷考[J].历史研究,1980(2):155.
- [22]饶宗颐.敦煌曲与乐舞及龟兹乐[J].新疆艺术,1986(1):18.
- [23]石路.释“熊踏”——兼谈唐代戏曲[J].新疆艺术,1985(5):66.
- [24]李正宇.晚唐敦煌本《释迦因缘剧本》试探[J].敦煌研究,1987(1):64.
- [25]黎蔷.西域戏剧的缘起及敦煌佛教戏曲的形成[J].敦煌研究,1990(2):110.
- [26]任半塘.唐戏弄: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877.

[责任编辑:周哲良]